

论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政治实践

——以“太祖平滇”为例

李培生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国家疆域观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对国家疆域的基本认识,其对国家疆域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明初,统治者在“天下一统”、承续元朝“正统”“华夷无别”“内外有分”的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突破当时语境下“中国”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实现了明朝西南边疆的展拓与稳定。“太祖平滇”是这一国家疆域观在边疆地区的重要政治实践,其后明朝在云南边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内边”与“外边”的圈层政区格局。

关键词:明初;国家疆域观;云南;太祖平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118-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20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Territory and Its Political Practic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ak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Retaking Yunnan Province into His Rule as an Example

LI Pei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territory is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y,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the state territor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rul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y views of unification, inheriting the orthodoxy from Yuan dynasty, no difference between Han people and ethnic group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land and frontier areas, realized the expans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areas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contemporary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China”.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practice from the views of national territory, the Emperor Zhu Yuanzhang retaking Yunnan province into his rule, gradually formed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olitical areas with Yunnan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territory; Yunnan province; Emperor Zhu Yuanzhang Retaking Yunnan Province into his Rule

疆域一般指某一政权或国家进行有效管辖的地域范围,而疆域观则是指疆域范围内的人对其政权或国家管辖范围的主观认知。国家疆域观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讲,古代中国没有“疆域观”,而是以“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兴灭继绝”的天下秩序观为主。这里所说的“明初国家疆域观”,是以明朝初年为时间节点,以明朝统治者为主,以对国家疆域范围(包括未实际控制的疆域)的认识为基

础,而形成的对国家的整体认知。谭其骧认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1]因此,对历史上的国家疆域和国家疆域观,就要以历史的视角,把眼光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看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在明朝初年国家疆域观影响下,当时国家疆域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收稿日期:2017-03-31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变革与继承:明代云南地区圈层结构政区研究”(yjs2016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培生(1989—),男,河南太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云南政治地理研究。

一、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特点

(一)“天下一统”的观念

“天下一统”的观念,萌芽于三代。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都大力宣扬“大一统”思想,力求让统一思想深入人心,以便完成自己的统一或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把实现“大一统”奉为其最高政治追求。^[2]

朱元璋起于东南,在元末反元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崭露头角,其缓称王、终称帝,渐次“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3]1314}。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对整个国家和国家疆域有了清晰的认识。早在起兵之初,朱元璋就曾对部下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3]211}此时,朱元璋已认识到,元虽为“胡人”“起自沙漠”,然其“据有中国”“混一海内”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可见朱元璋对元朝实现大一统的肯定,也表明朱元璋在起兵之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国家疆域观。称帝之后,其依然不忘实现“大一统”的最高政治追求:“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3]2977-2978}可见,朱元璋对重建“天下一统”的疆域范围,一直念念不忘,这也是其“天下一统”国家疆域观最直接的体现。

(二)承续元朝“正统”的观念

虽然实现“大一统”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奉为最高政治追求,然而,在南北朝国家分裂时期,“大一统”不复存在。在“天下一统”观念之下又衍生出“正统”和“闰统”之争。所谓“正统”,是一个政治概念,即奉谁为正统,就承续谁的天下,反之则被称为“僭”或“窃”。与此相应,就是承续正统,如能承续谁的正统,就能承续谁的疆域,而承续“大一统”王朝的正统,就能实现“天下一统”。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政权,其疆域范围空前辽阔。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天下一统”。由此衍生而来,就形成了明朝承认元朝在传统中国王朝中的正统地位,也就是“大明”承续“大元”的正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的逻辑。所以,明初统治者带着承续元朝“正

统”的观念,认为凡是元朝的疆域就应该为明朝疆域所继承。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敕书北元统治者:“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3]1041}可知,其认为元朝入主中原实现了对中国近百年的统治,今天元朝的“气运”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颁布《即位诏》:“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4]在登极之时,朱元璋既承认元朝是继“宋运”之后的“天下之主”,又认为元朝的气运已终,现在“大明”将要承续元朝的“正统”,实现“天下一统”。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天命论”的迷信思想,但这种逻辑的背后却是一个王朝政权是否合法存续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应,明朝的疆域观亦与此息息相关。洪武三年(1370年),《平定沙漠诏》:“朕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统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遗孽,时犯边圉,劳我师旅。”^{[3]1044}朱元璋认为“削平强暴,混一天下”的重要前提是“正大统”,同时,也正是因为“大统既正”才能实现“天下混一”“民庶皆安”的政治目的。朱元璋希望通过“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而实现历代非常重视的承续“正统”,又通过充分肯定元朝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可其“正统”的历史地位,进而承续元朝“正统”。承续了元朝的正统,就必然继承元朝的疆域,这也正是明朝初期国家疆域观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

(三)“华夷无别”与“内外有分”的观念

明初统治者具有浓厚的“华夷无别”或“华夷一家”的思想,这既是时代烙印,又是现实政治的必然需要。具体反映在国家疆域观上,即只要在元朝疆域范围内,不论“华”之所居,还是“夷”之所居,都是现在的明朝疆域。

朱元璋曾多次论及“华夷”皆为其子民,“咸推一视之仁”。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使诏谕元宗室:“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3]1048}洪武六年(1373年)又说:“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取万方……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3]1438}和“正统”观念一样,“华夷无别”的观念,

充分显示了明朝国家疆域观在处理“华”“夷”问题上的态度,认为华夷之疆域范围皆是明朝疆域之范围。在这一观念指导之下,国家疆域和朝廷子民,不分华夷,“皆朝廷赤土、赤子”。这就是明初国家疆域观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华夷虽然在“民族”属性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明朝的子民,因此华夷之土,也都是明朝的疆域。

“华”主要是指“汉族”,“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明朝疆域范围之内,与汉族相对应的其他少数民族,但并不指被称为“四夷”的附属藩国。例如,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颁布《天下诏》:“荷皇天宗社之眷……遂致华夏清宁,蕃夷臣伏。”^{[3]1137}这里的“蕃夷”并列使用,“蕃”是指附属藩国,“夷”是指与汉族相对应的其他少数民族。而明朝的“四夷”则是明初玺书所说的“凡四夷诸国皆遣告谕”的域外蕃属诸国,而不再指纳入中国疆域范围内的边疆少数民族。^[5]虽然在疆域范围和臣属关系上“华夷无别”,但明朝的国家疆域却包含“内外有分”的含义。正如“(五服制的)商郊牧野和国野制度的圈层结构”^{[6]199},亦如秦汉时期的“边郡”与“内郡”^{[6]201},明朝的“华夏之地”和“夷地”,亦“内外有分”。有学者认为,“明初统治者使用的‘中国’是含括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各民族在内的国家名称”^[5],是否如其所说,我们认为有待进一步商榷。明初语境下“中国”的指称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这并不影响明朝国家疆域观的表述,相反更加有利于解释明朝国家疆域观的完整性。此时,明朝统治者通常是用“大明”“天下”“四方”等词指代整个明朝疆域的范围,而用“中国”指代“华夏”之地,用“荒服”“夷”“狄”“蛮”等指代少数民族世居之地。因此才有先“奠安华夏”,而后才“天下咸归”的逻辑。这是一个由内向外,递进的层级过程。

这种“内外有分”的层级关系,尤以明初统治者在云南地区的政治实践最为显著。明朝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属于明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但是并不等于此时的云南边疆地区就包含在明朝历史语境下“中国”一词的范围之内。历史上“中国”一词多指汉族聚集区,或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外铺开,除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范围。葛剑雄认为:“一般说来,中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才被称为中国,而它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

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7]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和“夷狄”并列对立的记述还有很多。例如,“乃今自料,勇悍强犷,孰与陈、张?土地甲兵,孰与中国”^{[8]164},“(思伦发)欲图人民,广土地,与中国较胜负”^{[3]2970}表明明朝国家疆域的范围,这决然不同明初语境下“中国”所指称的范围。谭其骧说:“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不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看作非中国。”^[1]虽然作者是在批评这种做法,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记述是当时语境下的真实反映。明清时期的贵州、广西,尚且被认为“非中国”,更别说更偏远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了。

我们用“明朝疆域”而不用“中国疆域”来指称明朝疆域范围,并不是要否认明朝的疆域不是我们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疆域,而是认为明朝疆域观指导下的明朝疆域范围要比当时语境下“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广泛得多。如果仅将明代语境下的“中国”所指称的疆域范围视为“明朝疆域”,则大大缩小了明朝实际统辖的疆域,这也不符合明初统治者对国家疆域的实际认识。因此,我们认为明朝历史语境下的“中国”一词的内涵,并不是一个包含历代王朝疆域范围及各民族在内的国家名称。明白这一点,对合理认识明朝前期的国家疆域观至关重要。

二、明初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的“太祖平滇”

明初国家疆域观具有“天下一统”、承续元朝“正统”“华夷无别”和“内外有分”的特点,那么这一国家疆域观,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以“太祖平滇”这一具体事件为切入点,探析国家疆域观在明初平定云南过程中的影响。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平定元朝在云南残余的梁王势力后,自秦汉以来的“西南夷”地区被再次纳入中原王朝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明朝中央政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态度怎样?如何看待这一边疆地区?这不仅直接反映了明初的国家疆域观,也是维系明朝云南地区政治稳定及其政治实践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进军云南之前,朱元璋分别于洪武六年(1373年)、洪武七年(1374年)、洪武八年(1375

年)等,多次往谕云南。正如,洪武八年(1375年)吴云出发之前,朱元璋所说“今天下混一,四方宾服,独云南一隅未奉正朔”^{[8]165},他把云南视为“天下”“四方”的一部分,须奉明朝为正朔。这充分显示了明朝是以“天下一统”的观念来看待云南地区的,且要求云南必须奉明朝为“正朔”。

朱元璋的几次遣使招降并不顺利,未能兵不血刃地实现云南“奉版图,归职方”的目的。于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发动对北方元朝遗兵追剿的同时,诏敕诸臣:“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罪隐慝,在所必讨。”^{[3]2179}其认为,“云南”远在汉朝时期就已“置吏臣”而属“中国”,在近代的元朝,其亦属于元朝疆域,现在明朝既已承续元朝“正统”,那么作为“元之遗孽”负隅顽抗的云南地区理应重新归入明朝疆域。明初正是以这种“大一统”、承续“正统”的国家疆域观,指导着“太祖平滇”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以,明初对云南无论是招抚,还是发动统一战争,均因云南“旧属中国”“近属元朝”,故“在所必讨”。

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帅师征云南,“大军直捣云南……宜分兵径趋大理……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烦兵而下也”^{[8]165-166}。与“大军直捣云南”“宜分兵径趋大理”相比,“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烦兵而下”,对于云南腹里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因为内外有别和层级分明的国家疆域观的作用,而采取不同的进军策略。这亦是明初“内外有分”国家疆域观直接作用的结果。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征南大军取得白石江战役的胜利,滇中大震,“中庆、武定、澄江三路,皆诣蓝玉、沐英营降”^[9],云南的腹心地区基本平定。朱元璋立即下诏:“云南之地,自汉、隋、唐三代,皆中国所统,景元既有其省。”^[10]在承续元朝“正统”疆域观的指导下,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行省即为明朝的疆域,故命大军西进大理,全面收复元朝固有之疆土。段氏认为,“(大理)历代所不能臣,秦汉之际始通华夏,亦不过遣使往来”^{[11]549},希望恢复元之前“纳款封王”的状态。傅友德坚决拒绝,指出云南必须被明朝“籍兵粮,纳戍土”,并认为这是“万世不拔之计”^{[11]550-551}。傅友德之所以这样断然拒绝,也正是基于明初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的自然表现。其

后在旧元疆域范围内“擒段明,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咸降,诸夷悉平”^{[12]9},进而实现尽收元朝之疆域的战略目的。

初定云南之后,明朝统治者首先面临在云南设治管理的问题。明初国家疆域观对这一时期设官置吏的政治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征南大军遣使报捷京师,朱元璋立即遣使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比得报,知云南已克,然区画布置尚烦计虑……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率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以治之。”^{[3]2225}明太祖认为,“必置都司于云南”“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这表明了其把云南相类于内地的态度。此后,明朝开始在云南进行大规模设治。“三月己未,命礼部考故元官制。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为府五十有二……州六十有三……县五十有四”^{[3]2250}等,形成了52府,包括63州、54县和2000户所、6蛮部的政区格局。这一政区设置完全“命礼部考故元官制”而定,“借此宣告明朝的西南疆域范围是元朝在西南边疆设官置吏进行控制的区域,凡在元朝纳入云南行省的地区都是明朝的西南疆域”^[5]。同时,明朝在云南的设官置吏及政区名称,完全依照内地形式,体现了明朝“华夷无别”的疆域观在云南的实际运用。同时,也显示了明朝统治者在初定云南时期,对云南边疆复杂的民族形势认识还不够清楚。虽然这套行政体系并未真正实施,但客观上也为之后明朝统治者把“华夷无别”国家疆域观的内涵扩充为“内外有分”的国家疆域观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这套行政体系的设计,意义依然重大。随着对云南认识的加深,明朝统治者的国家疆域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内外有分”疆域观的指导之下,云南腹里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区形式,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云南逐渐形成了“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12]1171}的具有明朝特色的“内边”与“外边”的圈层政区格局^[13]。

三、结语

元明鼎革之际,云南因地处边疆地区,成为明初国家疆域观的重要“试验场”。此时的国家疆域观

以“天下一统”、承续元朝“正统”“华夷无别”“内外有分”为特点,突出反映了明初国家疆域观的时代特征。在“太祖平滇”的过程中,明朝统治者并没有把明朝疆域限定在“中国之旧疆”范围内,而是突破当时语境下“中国”所包含的地理范围,进而承续元朝“正统”并继承元朝管辖的所有疆域。在政区设置上,初定云南时,由于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外形势认识不足,明朝统治者仅“考故元官制”,以等同于内地“府州县”的形式统治整个云南地区,之后在“内外有分”国家疆域观的指导下,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从而实现了云南边疆地区与腹里地区的良性互动。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在不同时期随着不同政治实践的推进,也在发生变化。同时,受不同时期国家疆域观的影响,政治实践活动也发生着不同的走向。明初统治者在正确的国家疆域观指导下,实现了云南地区的“奉版图,归职方”及云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谭其骧.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7-45.
- [2] 肖婷. 明代云南边疆观研究:限于王朝视野下的探讨[D]. 昆明:云南大学,2015.
- [3] 明实录·太祖实录[M].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 台北:中文出版社,1962.
- [4] 朱元璋. 明太祖集[M]. 胡士萼,点校. 合肥:黄山书社,1991:1.
- [5] 陆韧.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9(5):34-42.
- [6]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7] 葛剑雄. 中国历史疆域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 [8]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9] 倪蜕. 滇云历年传[M]. 李埏,点校.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249-250.
- [10] 张统. 云南机务抄黄[M]//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556.
- [11] 大理战书[M]//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 [12] 张廷玉. 明史·地理志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 陆韧,彭洪俊.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1):33-42.

